

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师友情

◎ 浙浙人物 □ 胡月梅

一、结缘日本受奖掖

蒋百里与梁启超结缘,是在1901年4月,当时蒋百里与蒋尊簋一同留学日本,由蒋尊簋的父亲蒋智由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,并嘱他们到日本后拜见梁启超,让梁启超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对他们加以关照。蒋百里与蒋尊簋在东京安顿下来后,梁启超即把他们安排到了自己创办的东亚商业学校(原东京高等大同学校)。蒋百里也在此时结识了梁启超的得意弟子蔡锷,两人立即成了形影不离、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那时,梁启超与弟子们年龄没相差几岁,精神上打成一片,亲密无间,无时无刻不在启迪思想,共同奋进。

在日本,蒋百里与蔡锷一起立下了军事救国的志向,但弃文从武,必须先进入日本的初级士官学校——成城学校。由于事关军事,日中两国有约定,像他们这样的自费生,既无督抚的咨文,又无原籍地方官的推荐,是没有资格入学的,于是他们只得求助恩师梁启超。梁启超见他们志向坚定,就通过1898年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到成城学校疏通,免去一切繁琐手续,让蔡锷与蒋百里进入该校,实现了他们学习军事的愿望。1902年冬,两人从成城学校毕业,又经过一年的联军实习,于1903年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蒋百里学步兵科,蔡锷学骑兵科,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,成为士官之杰。师生三人当时都是头角峥嵘的人物,他们怀着拯救国家命运的伟大理想,在民国初年动荡的政治舞台上,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,为着中国的统一强盛而奔忙。

二、密谋护国同患难

1915年,袁世凯倒行逆施,帝制自为的野心外露。梁启超、蔡锷、蒋百里师生三人思想一脉相承,时刻把国家命运放在心上,因此,三人常常在一起切磋问题,密谋反袁,暗中策划利用蔡锷云南贵州的旧部,采取武力讨袁运动。

曹聚仁在《蒋百里评传》中言:“反袁之役,梁启超与蔡松坡唱起了双簧,蔡松坡与蒋百里也唱起了双簧。”所谓唱双簧,即梁启超、蔡锷、蒋百里师生在北京政界自说自话,蒙混过关,躲过袁世凯的严密监视。1915年12月,等蔡锷、梁启超相继脱离虎穴之后,1916年3月,蒋百里也相机离开北京,南下上海,然后追随梁启超,转道香港,进入广西,与梁启超一起作护国军的幕后策应。待两广宣布独立,“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”成立,梁启超任参谋,蒋百里任司令部出师计划股股长主任。1916年3月22日,各省独立,袁世凯四面楚歌,不得不取消帝制;随后忧急成疾,一命呜呼。

护国成功后,蔡锷喉疾日趋严重,竟



1919年,蒋百里随梁启超游历欧洲。图为他们在法国时的合影,前排中为梁启超,左二为蒋百里。

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去世。此后,梁启超、蒋百里两人也愈加成了“天下事同患难”的师友关系,很长一段时间,他俩痛感于军阀的不能合作,都退出政界,一起研究学问去了。其时,两人的往来更加密切。

三、欧洲游历传佳话

1918年11月,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失败投降结束,梁启超以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。一行七人,其中包括蒋百里。1918年12月23日动身,1920年3月5日回国,历时一年有余。此行,在一个多月的航船上,梁启超几乎每天与蒋百里下棋、谈文学、学论文,生活很充实,也很有闲情雅致。在欧洲,他们历经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意大利等国,各自整理自己的日记材料,沉淀自己欧游的所思所想,为祖国文明发展寻药方。

蒋百里回国后即写成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,成为中国人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开山之作。书成之后,蒋百里求序于梁启超,梁欣然应允,但他“下笔不能自休,及成,则篇幅与原书埒。天下固无此序体,不得已宣告独立,名曰‘清学概论’,别索百里为余序”,另为蒋百里的书写了序言。蒋百里也为梁启超的书写了序言,此事成为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梁启超、蒋百里两人在经过一年多的欧洲游历之后,他们在思想上的碰撞、交融更加密切,灵魂上的同鸣共振也更多,他们的师生关系,发展成为真正精神相契的挚友。

四、共同推进新文化

从欧洲回来后,梁启超积极投入到社

会文化的建设工作中,蒋百里成了他的得力助手。他们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,颇想一面整理国学,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和新学识,使二者融会贯通,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。

欧洲回来之后,他们组织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。一是共学社,主要业务是编辑各国新书,使欧美思想学术文化在中国广为传播。二是松坡图书馆。1923年11月4日,为纪念蔡锷(松坡),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,成为当时一家颇具规模的私立图书馆。后来,该馆并入北京图书馆。三是发起讲学社,每年邀请一位国际学者来华讲学。由于梁启超事务繁忙,以上三个机构,具体事务都由蒋百里主持,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。

对于蒋百里的道德文章和个人品格,梁启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:“方震学问文章,世之贤达都能知之,其他日事业成就,盖本可测,视时会如何耳。顾启超久与游,独深敬其天性过人,盖尝间关数千里,两度急其友蔡锷、戴戡之难;既不可救,归时则与启超相对作孺子泣。又制行绝介,位至将军,而饔飧恒不继,曾不屑有所攀援,亦未尝戚戚,虽饥不忘天下。”

正当他们埋头新文化工作时,政局也在瞬息万变中,蒋百里开始越来越关注并参与联省自治运动,欲以省宪来约束军阀,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,此事也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。可惜,由于各地军阀都在紧要关头丧失长远战略,蒋百里统一中国的美好愿望成了泡影,诚如梁启超写给女儿的信中所言:“国事大有可为,能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。”

遗憾的是,人力不敌命运,当蒋百里尚在多方奔走斡旋于军阀之中时,1929年1月19日,恩师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仙逝,蒋百里未能亲往吊唁,把酒祭奠,痛定思痛,痛何如哉!

施恩于人不张扬

□姚素川

武则天当政时,狄仁杰和娄师德同在朝中担任宰相。不过,狄仁杰总认为自己比娄师德有才华,处处排挤娄师德。

武则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她明白,这件事情如果自己处理不当,不但有可能加深两个人的矛盾,还有可能在文武官员面前失去自己的威信。

一天,武则天派人将狄仁杰叫来,陪同自己在御花园里散步。走了没多久时间,武则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狄仁杰:“我知道你的个人能力很强,办事果断,但你有没有想过,我之所以这样重用你,你知是什么缘故吗?”

听了武则天的问话,狄仁杰想也没想便回答道:“我凭借文章和道德进身仕途,并非是靠他人提携和帮助的碌碌庸人,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得明白。”武则天没有立即说话,而是沉吟片刻说道:“你才思敏捷,忠心耿耿,这是事实。不过,

当初你进宫后,我对你并不了解,你之所以受到如此重用,实在是由于娄师德的大力推荐。”

说罢,武则天叫人拿来提前准备好的文件箱,从中找出十多份娄师德之前推荐狄仁杰的奏表,最后递到狄仁杰的手中说:“你好好看下这些奏表吧,看完后你就会明白,娄师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。”狄仁杰看过那些奏表后大为吃惊,他实在没有想到,自己一直视为眼中钉的娄师德竟曾经这样大力提携过自己,可他却从来没有在自己面前提起过半句。意识到武则天是在委婉地批评自己时,狄仁杰立即向对方承认了错误。

走出皇宫后,狄仁杰愧疚不已: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娄公会如此宽容自己,最主要的是,娄公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因施恩于人那份张扬的样子。从那以后,狄仁杰被娄师德不计私怨、秉公举贤的高风亮节彻底折服了。

人际交往中,那些不计个人恩怨、公正举人的人,历朝历代都会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推崇。

流沙河一字不苟

□张达明

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笔走龙蛇,是饮誉海内外的的大诗人,也是台湾著名学者余光中的挚友。一次,余光中应邀来四川大学讲学,流沙河全程相陪,两人在讲学间隙去诸葛亮武侯游览。当来到三国名将张飞塑像前时,他们发现一个“难以置信的大错误”,解说牌上竟赫然写着“张飞字益德”。流沙河脱口而出:“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,谁不知道张飞的字为翼德?作为海内外闻名的古迹,怎能犯如此低劣的错误呢?”余光中也随声附和:“确实不应该呀。”

余光中返台前,叮嘱流沙河一定要将这件“小”事弄清楚。带着挚友的嘱托,流沙河几经查找资料,终于从《三国志卷三十六·蜀书六·关张马黄赵传第六》上得到了答案:《三国志》出自西晋史学家

陈寿之手,被公认为记载三国历史最早的史学著作,里面清晰记载着“张飞字益德”。而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,是经艺术加工将“张飞字益德”改为了“张飞字翼德”。也就是说,武侯祠“张飞字益德”的介绍,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并未出错。

流沙河赶紧去信将实情告知给余光中,写道:“当对一件事存有疑问时,切不可草率下结论。只有抛弃臆断,下功夫弄个明白,才可避免尴尬。”余光中回信称道:“先生卓然而立的求真精神,令我敬佩,也让我感触颇深;做学问者要有个性,人云亦云断不可取。”

上述“小”事,在他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,但对于治学严谨的两位大家来讲,却并不“小”。流沙河检讨自己“人云亦云”,不仅反映出他们对“真”的执着追求和不逢迎附和,也体现出做学问者更需具备卓然而立的品质。

《老残游记》是如何诞生的

□阎泽川

1903年9月21日,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绣像小说》第9期开始刊登通俗小说《老残游记》。

《老残游记》先是在《绣像小说》连载了八回,两年后又在《天津日日新闻》逐日发表至第二十回。该小说刊发后,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。然而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,人们只知道作者的笔名是洪都百炼生,关于作者的真实身份却众说纷纭,谬误百出。直到1939年4月,发表于北平辅仁大学校刊《文苑》的一篇文章才将作者及作品创作的原委大白于天下。从此刘鹗之名与《老残游记》并传于世。

□唐宝民

谢家麟先生是中科院院士、国际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学家、“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”。他是一个物理学研究方面拥有极高天分的人,同时也是一个小名利看得很淡的人,从不计较名利得失,真的把名和利当作了浮云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中央决定上马高能加速器工程,谢家麟被任命为工程经理。到了80年代中期,工程计划已经完成了大部分,但此时谢家麟因为患有肝病,落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,他开始服用安眠药。有时,他一晚上要服用三回,第二天早起开会,走起路来就歪歪扭扭的,甚至无法掌握方

向,于是,他便找到中科院领导,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。许多人对他这个请求都深感意外,因为在那时,工程已走过设计、科研、部件加工等程序,只剩下最后一道安装工序了,谢家麟完全可以等到完工再辞职的,可他却说:“我的精力不够了,应该退位让贤,交给年轻人去做。”有人因此评价他说:“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!”

工程结束后,在给谢家麟申报材料时,所里的同事一点点向老人确认当时工程的细节,没想到,谢家麟满口都是:“这个不是我做的,我只提了些意见。”“那个是某某做的,你得问他。”不但不主动揽功,反而把属于自己的功劳让给别人,这样的高风亮节,令大家非常感动。

莫干山防疫往事

◎ 文化史谭 □朱炜

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上海、杭州等地公共卫生事业不佳。夏天,特别是入梅后,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变得像个“培养热带传染疾病的皮氏培养皿”。疟疾、伤寒等传染疾病,一天之内就可以让一个成人倒下,还有其他不足以致命,但让人疯狂的热疹、湿疹等。那时,有条件的家庭会选择去莫干山避暑,那里有洁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消除身体的不适,凉爽的夜晚让人们特别是让免疫力弱的孩子休息好。

“空气清洁,极少尘埃及微生物,又因竹林遍山,四时长青,空气微觉芳馨。”“夏令温度凉爽宜人,尤宜于病体之休养。”医学博士、曾任莫干山疗养院院长的周君常如是推荐莫干山。疗养院的出现,是中国人卫生观念增强、健康意识提高的产物。如果说,北京西山疗养院是中国疗养院之始,那么,莫干山肺病疗养院则是中国肺病疗养院之始。对防疫事业如此重视,莫干山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。

1928年,莫干山管理局成立时设二课,第二课职责中明确有关于公共卫生、防疫医药等事项,具体包括在避暑区内清洁道路、设垃圾箱、建筑公厕,向山民赠捕蝇拍,开辟公共小菜场、创办屠宰所、筹设夏季临时施诊所、改良导水管等。银行家周佩箴长子周世杰曾任莫干山管理局首任第二课课长。1932年夏,黄膺白、张静江、周庆云等人发起成立莫干山公益会。常务董事黄膺白早在1923年就代表政府奖励哈尔滨等处办理防疫成绩突出的人员,对此项工作有一定的认识。董事兼调查主任王

吉民是医生,系中华医学会早期会员,抗战时期曾任上海中国防疫医院院长。该会总章附则《本会自治规约》第三条“卫生事项”达七款,第七款专涉防疫:“遇有疫病时应设施防疫方法,由董事会筹办之。”此防疫办法影响了莫干山麓庾村以及原武康县。

1932年秋,武康设县立医院,初称武康县诊察所,以修葺后的原武康县文庙为院址。浙江省立医院赞助,同时省院还附设武康妇婴保健事务所。诊察所成立之初,适逢乡区疫病盛行,民众死亡众多。该所以维护民众健康为使命,从事防疫工作,数日疫患消除,后致全力于公共卫生事业。更名武康县立医院后,专设防疫一股,掌理关于传染病之调查预防及扑灭事项。以预防流行性脑膜炎为例,1933年1月原武康县第一区四保乡发生脑脊髓炎,未及一月,塘泾、二都、杨家山等处继续蔓延,其他若乌山、三桥埠、康上诸地亦时有所闻。该院当即备具疫苗,赴流行区域预防注射,一面呈请县政府,通令全县各区乡镇,厉行疫症报告、隔离病人及清洁消毒等办法。1933年6月,武康县立医院鉴于各菜馆卫生堪忧,有染疫之虞,爱请县政府转飭各菜馆厨师到医院进行卫生训练。训练为期十日,讲述科目有饭馆十二要、水之清洁法、传染病媒介、苍蝇之害及灭除方法等。《湖属六县自治状况》(1934)赞誉:“武康县立医院每届传染病发生时,即分期注射防疫苗,以期预防。每届夏令,复于各区设置临时防疫所,注射防疫针,经费由各区就地劝募。”“(武康县立医院)于诊疗之余,复为保健防疫之工作,将来功效必非浅鲜。”

莫干小学校董沈亦云在莫干小学十五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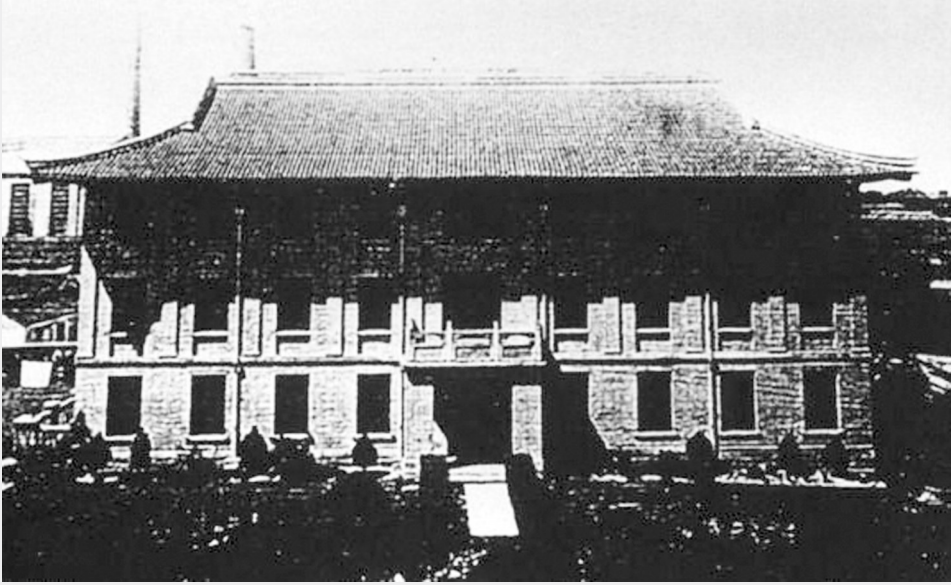
校庆演讲中特别提到,“在战前,除学校外,农民最得益便之事,为医诊室与仓库。医诊室仅作小范围之防疫施诊,附设在莫干小学,当时所费不过小学四分之一。”庾村设有农村改进会,邀请武康县立医院试办家庭卫生,先调查农家卫生状况,次按户访问,宣传常识,治疗疫病。之后,由农村改进会和莫干小学合办卫生室及分诊所,每逢星期五派员前往诊视,旋改为逐日诊疗。如果时疫流行,则注射防疫针,设临时隔离观察室,全部实行免费。

1938年,战火烧到莫干山附近,浙西难民一时群聚,一开始就有五六千人,在山中外人士明美丽、许安之、沈亦云等组织了莫干山中外避难居民救济会,使数千难民终获保全。其中,救济会工作很重要的一项,就是借用原莫干山西人避暑会医院及部分药品用具提供诊疗,劝募大量药品,施种牛痘,打疫苗。许安之先生经募得上海工部局捐赠痘苗10大瓶,约300人量;伤寒霍乱混合疫苗180瓶,计可注射3600人,当即代为分发附近各慈善医院外,救济会诊所于门诊时间派员分赴本山中难校、收容所并山下附近村庄,注射者共计1176人。因不断有委员离山,救济会由委员会改组为理事会,历四届,潘蔚岑医生受聘来山服务后,就诊者日有增加。据《莫干山中外避难居民救济会理事会一周年工作总报告书》,“兵燹之余,继以防疫……如此防治兼施,其中所全活者,不知凡几”。

今天,防疫是全球公共卫生最重要的课题,当年莫干山防疫的一些做法,也许今天仍有参考价值。

◎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,都有一段历史



百年前的宁波华美医院

1843年的冬季,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孤身来甬,在宁波老城北门外的佑圣观,创办了“浸礼医局”。这不仅仅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的起点,也是宁波乃至浙江省西医东渐的原点。第二任院长白保罗将诊所迁至百米外的姚江畔,增设男女病房,更名为“大美浸礼会医院”。1920年更名为华美医院。1926年,医院兴建住院大楼,得到了国内社会各界的捐款,大楼以“华美”命名,矗立于姚江畔,至今仍用于医疗事业。1954年,更名为宁波市第二医院,但老一辈宁波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“华美医院”。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直属附属医院。

照片提供者:江雨